



# 明末东北自然灾害与女真族的崛起

王景泽

(北华大学 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吉林 吉林市 132013)

**摘要:**学术界普遍注意到了自然灾害与明朝灭亡的关系,然对与女真族兴起的关系却关注不够。事实上,明末东北地区自然灾害频仍,促使女真族内部相互攻掠,建州女真乘机兴起。灾荒也成为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因素之一;政策失误与自然灾害交互作用,亦使进入辽东的后金陷入困境。皇太极统治时期灾害不断,他除了调整政策、发挥八旗的作用、逼迫朝鲜提供经济支持,便是大规模掠夺明朝,既削弱了对方,也有助于渐渡危困。但无论明朝灭亡抑或女真族兴起,自然灾害的作用皆视乎王朝政治与人类社会基本状况而定。

**关键词:**明末;东北;自然灾害;女真族兴起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4-0048-06

近年来,一则消息在史学界逐渐引起兴致,即太阳黑子活动与明朝灭亡的关系。据媒体刊载:“香港旅美宇航科学家翁玉林认为:1644年明朝灭亡,与太阳黑子消失关系密切。翁玉林指出,黑子出现会改变紫外光和能量,黑子愈多紫外光愈多,黑子愈少地球天气愈寒冷。他发现,在明朝灭亡前后约70年,太阳黑子消失。那时候欧洲出现小冰河时期,中国则气候突变,天灾令农作物失收。‘若非明朝末年天灾,农民不会因小事而造反。天灾同样在满洲出现,迫使满洲人四出讨伐,既为土地也为食物。’他相信,在复杂的政治氛围外,太阳黑子引发的气候巨变,是促使明朝政治巨变的幕后原因之一。”<sup>[1]</sup>

从科学角度来说,翁氏所言是否圆满准确,非本文所能讨论,然有学术研究成果为之遥证。据专家称,1400—1900年间,各地极端初霜期较现代明显提早,内蒙古和东北大约比现代早30天以上,1620—1720年是寒冷冬季,按世纪划分则以17世纪为最冷<sup>[2][3]</sup>。另有学者综合了已有相关论述,指出:研究表明,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十分寒冷,有称“明清小冰期”。特别是15世纪至17世纪寒冷特征最明显。有的专家认为,16世纪至17世纪这个小冰期是受整个银河系、太阳系、行星处于不同位置而引起的引力、电磁场、宇宙线、宇宙空间物质密度变化等变化而来的,故又称这个时期为“明清宇宙期”。“在传统社会里,低温会使农业

生产受到致命的影响,自然灾害的频发则影响农业生产,民生日苦,同时也直接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进而造成引起中国传统社会剧烈的社会动荡,形成大迁移、大移位、大战乱。”明清时期中国北方地区游牧民族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状态;女真族一直呈现往南迁移的趋势;黄河流域农业经济进一步衰落,沙漠化进一步向南拓展<sup>[4]第一章第六节</sup>。

明史学界的相关研究也证明:“无论从灾荒总数,还是成灾频度,以及灾荒的破坏力,明代的灾荒都是空前的,仅以灾荒频度而言,明代也首当其冲。”这其中,北方地区是高发区<sup>[5]5,11①</sup>。究之史实,结论是可信的。然而,更加严重的是自然灾害的破坏程度。明代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区域差别悬殊,尤以西北、东南鲜明。北方以粗放式农业为主,长期的开垦耕种,导致水土流失,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九边镇的大部分地区,因兴屯田,率皆如此。于是偶一逢灾,便致重荒。至于说到王朝后期自然灾害频仍,非绝对频仍也,实政治败坏、民不聊生而予之醒目。明朝是最典型的。

明朝后期并不是自然灾害频度最高期,但破坏力却异常强烈,北方地区最甚。自万历至明亡,北方地区的天灾主要是水、旱、寒、蝗。仅以明后期破坏最严重的旱灾为例,以《明史·五行志》为据,罗列如下,以观其概<sup>[6]第2册②</sup>。

(1)万历四年十二月命礼部祈雪。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九年、三十七年、四十七年,亦如之。

① 本文于此用“自然灾害”而不用“灾荒”,是要突出自然力的作用。

② 因辽东将专论,此不举。

收稿日期:2008-01-20

作者简介:王景泽(1963-),男,吉林白山人,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明清史、中国东北史。

崇祯五年十二月，命顺天府祈雪。六年、七年冬，无雪。

(2)万历十二年秋至十三年四月，京师不雨，河井并涸。十四年三月，以久旱，命顺天府祈祷。十八年四月，旱。二十六年四月，旱。二十七年夏，旱。二十九年，畿辅、山东、山西、河南旱。三十年夏，旱。三十四年夏，亢旱。三十七年，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皆旱。三十八年夏，久旱，济、青、登、莱四府大旱。三十九年夏，京师大旱。四十二年夏，不雨。四十三年三月，不雨，至于六月。山东春夏大旱，千里如焚。四十四年，陕西旱。四十五年夏，畿南亢旱。

天启元年，久旱。五年，真、顺、保、河四府，三伏不雨，秋复旱。

崇祯元年夏，畿辅旱，赤地千里。三年三月，旱。六年，京师旱。十年夏，京师及河东不雨。十一年，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旱。十二年，畿南、山东、河南、山西旱。十三年，两京及登、青、莱三府旱。十四年，两京、山东、河南及宣、大边地旱。十六年五月，祈祷雨泽。

以上只是自然灾害之一，而且多有失载。如崇祯十三年，“山陕河南大旱蝗起，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sup>[7]142</sup>。能够记入正史的灾害，应当是破坏惨烈、为害严重的，失载者尚且“人相食，草木俱尽”，记载者又能到何程度？明朝后期北方地区之社会状况，仅从灾异角度即可见一斑。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旧史所载自然灾害，基本局限于王朝直辖之地，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鲜有顾及。大自然降灾，是从来不考虑政治格局的。明朝后期长城以外，包括东北地区，同样遭受着自然灾害的频繁摧残。从蒙古草原的“赤地千里”，到辽东女真的“漂没人畜”，其受灾程度未必亚于内地，只是因为人口密度的关系，灾民少于中原而已。

那么，具体到明末女真族崛起，与自然灾害到底有什么关系？笔者草撮零散资料，期能简予素描。



关于明末女真族地区自然灾害状况的史料少之又少，但明朝和朝鲜方面，以及后金建国之后，还是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片言只语，将其萃集，尚有一个粗略的线索，作为探寻的踪迹。

清朝《太祖实录》、《太宗实录》，是研究清入关前史的重要资料，但其多为彰显帝王创业事迹，于自然灾害少有录及。不过，间接的载记仍透露出些许信息。例如《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甲申年（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五月某夜，有贼入努尔哈赤庭院，被其击昏，亲族至，皆言杀之。努尔哈赤道：“我若杀之，其主假杀人为名，必来加兵，掠我粮石，粮石被掠，部属缺食，必致叛散。部落散则孤立矣，彼必乘虚来攻。”<sup>[8]307</sup>此段话说明，努尔哈赤存粮不多，而粮食关系到部落聚合离散；同时可见，掠夺经济盛行于女真族中，掠夺经济的存在，正是生产力低下的倒映。再如《满文老档》载：癸丑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以若征国人粮

赋，则国人受苦。遂令各牛录出男丁十人、牛四头，始于荒地耕种之。自是免征国人粮赋，国人遂无忧苦。粮储转为丰足，于是建造粮库。此前从无粮库。”乙卯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诸贝勒、大臣请出兵征明，努尔哈赤不允：“今若征明，义在我方，天佑我也！天既佑我，或有所得。即有所得，则其所得人畜何以养之？我等尚无粮库，养其阵获之人畜，则我等原有之人均将饿死矣！乘此闲暇，宜先收我国人，固我疆土，整修边关，垦种农田，建仓库以积粮。”<sup>[9]上册,19,32</sup>由此可知，努尔哈赤建国前夕，建州女真尚无规模粮食储备，并非粮食丰足无需储备，而是至多仅供食用无余粮可储备；同时，或许其中暗示着农耕歉收或遭逢自然灾害。

明朝和朝鲜史料，对此有所补益。万历十四年（1586年）夏，辽东大水；八月，辽东巡抚等请急赈恤；九月，辽东水灾，十二月，“辽东抚按会题：辽镇今岁雨水风虫相继为灾”<sup>[6]第2册,453[10]四,94,100</sup>。

据金人后来回忆：“昔明辛卯年大涝，山为之崩，人亦漂去”<sup>[9]下册,1325</sup>。辛卯年为万历十九年。这一年，建州攻取了长白山鸭绿江部，而朱舍里、讷阴部亦联合叶赫部劫掠了建州所属山寨。自然灾害又使女真族互相攻伐。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奉使建州，其与建州人对话有言：“往在戊子年间，你国地方饥馑，饿莩相望，你类归顺望哺于满浦者，日以千计。”<sup>[11]20</sup>戊子年为万历十六年（1588年）。是年，努尔哈赤与哈达部联姻；而叶赫部“歹商、猛骨孛罗告饥”，明朝“各予粟百斛”<sup>[12]147</sup>。“时有酸之首长葛儿气峻儿戈率本部军民归，太祖以其子非英冻为大臣。又东果部酋长克辙孙呵阿里，亦率本部军民归，太祖以长公主嫩姐妻之，授以大臣之职。又鸭里古酋长胡喇虎，杀兄弟族众，率军民来归，将其子胡里罕赐姓觉罗，为养子，亦授大臣之职。太祖遂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与大明通好，遣人朝贡，执五百道敕书，领年例赏物。……互市交易，照例取赏。”<sup>[8]312</sup>这场饥馑，当然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而努尔哈赤正是借助着“饥馑”，迫使周边各部“归附”遂日益壮大。他度过灾荒的办法，是与明互市、“借食”朝鲜，同时对未归附部落进行掠夺与征服。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朝鲜《李朝实录》载：“时西方失稔，虏地尤甚。老酋遣人来言于满浦曰：‘我境年凶如此，明春难以生活，闻朝鲜多有蓄积云，幸相赈救’云云。兵使李箕宾驰启曰：‘往年胡地失稔，故去春胡人之取食满浦者日数百人，仅以支过。今年比往年尤甚，明春之胡人取食满浦者必加于上年，未审何以处之乎？伏望自朝廷预为指挥’云云。今年江边赤地千里，土民皆怀流散，而官无储谷，赈救无策，加以胡地又如此，明春窃发之患，极可虑。”<sup>[13]第7册,2683</sup>是年，曾被建州灭亡而努尔哈赤迫于明朝压

力又不得不使之复国的哈达部，“国饥，人皆无食，向大明开原城祈粮，不与，各以妻子奴仆牲畜易而食之。太祖见此流离，仍复收回”<sup>[8]321</sup>。可见此次旱灾波及较广，而且是连年灾害。为整合力量，努尔哈赤于当年编定了40牛录<sup>①</sup>。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朝鲜文献称：“今秋失稔，北道尤甚”；辽东巡按御史报：“建州联西虏暖兔伯，缔昏忽刺温，借粮朝鲜，声势叵测。”<sup>[14]271[15]123</sup>海西女真辉发部于本年亡于建州。三十六年，辽东巡按赵楫言：“边地灾伤，无处不苦，宁远、前屯一线通关，地尤沙磧，开原、铁岭三面环夷，民乏恒产。”建州的动向则是攻掠乌拉部的一个山城，“杀千余人，获甲三百副，尽收人畜而回”，同时向明朝示好，沿边界立碑<sup>[10]4,311[8]325</sup>。三十七年，辽东又逢大水灾。四十一年(1613年)九月，辽东大水，次年明朝官员称：对建州“令其粮餉不敷，如遇饥荒叩乞乞哀，于清、抚之市暂准各余，如四十年故事，以彰我生养之德”<sup>[6]第2册,454[16]547[17]第2册,179</sup>。知建州曾遭大灾，努尔哈赤只得求助于辽东地方当局。他遣众越界耕种，明朝官员认为：“奴酋擅貂参海珠之利，蓄聚綦富，独其地颇饶瘠，粮料时苦不给，欲为广垦储粮之计。”<sup>[18]第4册,2107</sup>看来建州地区地瘠产低，粮食匮乏，最易遭致饥荒。四十三年，辽左旱灾，“处处灾旱，司农告乏”<sup>[10]4,481[15]118</sup>。四十五年二月，朝鲜地方官驰启：“建卫住胡罗可多等十一名归顺来到，女真训导河世国探问，则言唐人五十名铸铁于暖阳堡近处，奴酋闻之，发军捕杀。天朝亦发怒，拘留向化，废去场市。奴酋反有降志，代送胡人四十余名，故复令开市。且言上年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云云。许多群胡逐日出来，则供给之物，想必浩大。”<sup>[14]277</sup>。由此观之，刚刚建立的后金国家，遭遇的自然灾害是比较严重的。而明朝当局在处理与女真关系时，动辄以闭市相要挟，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把努尔哈赤逼上了反明的道路。

努尔哈赤于灾害之年建国，藉以鼓励士气；亦于灾害之年发动对明战争，其初始目的是经济掠夺，度过饥荒，防止人心瓦解。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八旗兵占领抚顺，揭开了明、金战争的序幕，也使辽东地区在一段时期处于自然灾害与战争人祸的双重笼罩之下。同年六月，“辽东饥，议开登莱海运，招商募舟”；“夏大旱，赤地千里，米一石银四两，粟二两，刍粟空竭，人马倒死相枕藉”；第二年冬，“辽地大雪，多冻饥”<sup>[19]第5册,5073[12]20,19</sup>。而泰昌元年(天命五年，1620年)灾害更加严重。“辽东旱，巡抚周永春以援兵四集，采买维艰，请旌劝本镇输助官民”；“辽东

旱，木株尽萎，巡按御史陈王庭疏请济发。略云：……奈河西宁锦一带自春徂夏，踰时不雨，千里已成赤地。河东开铁诸处早为戎马之场，独辽阳海盖春初稍沾雨泽，禾苗尽出，满拟有秋之望。不意六七两月早魃为虐，炎热若焚，辽阳禾穗未秀而枯，刍谷尽槁，即泽草木亦皆焦枯”。后金方面，据熊廷弼疏称：“贼中部落无食无盐无布”<sup>[16]587[10]五,251[20],139</sup>，所以，努尔哈赤抓紧了对明朝边境地区的劫掠。

同时，河西地区大旱受灾者也包括东蒙古诸部。“蒙古诸部大饥，多人塞乞食”。明朝户部郎中傅国反对经略袁应泰大收蒙古饥民，认为：“西夷所以荒者苦二千里之旱也。即我辽左亦然，天未斗割也。唯我以天下全力注辽，故辽千里之旱不觉耳。奴之荒则与西夷共之矣，闻矣病饥甚，自贍不足。”<sup>[16]590[8]156</sup>自然灾害并不顾及政治疆界，所以在辽东，明、蒙、金皆受到灾害的侵袭。明朝因抗金而“天下全力注辽”，故而未觉灾重。后金摆脱困境的方式，主要是掠夺明朝。天命五年六月，后金军队“入抚顺路，直至沈阳城外十里处，杀明兵百人，俘获四千，掘取窖粮载归”<sup>[9]上册,146</sup>。蒙古方面因受灾较重，且内部政治分裂，情况复杂，有人塞乞食于明、请求封赏者，有投金、附金者，有趁火打劫掠夺明朝者，亦有与后金争夺者。如天命四年后金与札鲁特蒙古盟誓结好，“盟誓期间，蒙古国因无粮谷，屡至开原、铁岭掠粮。或掠粮而去，或被擒拿，夺其牲畜，凡有七八次，获牛计千余”<sup>[9]上册,126</sup>。辽东地区的政治关系，受饥荒影响而更加复杂化。

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久旱<sup>[6]第2册,485</sup>。持续的自然灾害必然加剧饥荒，也加速了后金征明的步伐。是年，八旗兵以摧枯拉朽之势，连破沈阳、辽阳及河东70余城；次年克广宁及河西40余城堡，山海关外几乎尽为金有。只是努尔哈赤收缩战线，并避免与蒙古冲突，下令退守辽东，明军方构筑起宁锦防线。

占领了富庶的辽东，后金应当增强了抗灾能力，稍纾困顿。然而，首先由于努尔哈赤政策失误，激化了与汉族的民族矛盾，以及先后迁都辽阳、沈阳，大兴土木，导致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社会动荡不宁；其次是蒙古地区饥荒严重，许多蒙古贵族投金，努尔哈赤为推行联蒙政策，“恩养”来者，经济负担加重。因此自入辽东，后金并没有出现经济繁荣，反而长期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天启六年，又一场大灾难降临，“霖雨为灾，山海关内外城垣倒塌，兵马压伤”。后金无详细记载，但称：“时因粮荒，逃叛者纷纷作乱。”<sup>[10]六,509[9]上册,631</sup>面对灾荒和反叛，努尔

① 万历三十年十一月，巡按御史何尔键疏中谈到辽东灾况：“迩来雨暘不时，年岁不登。悬磬枵腹，十人而九。先是四五月，青黄不接，所在嗷嗷，菜色遍野。……及至六月以后，阴魔为难，霖雨时行。兼以辽河大泛，所在为鱼，漂庐损舍，毁木伤稼。”《按辽辑档书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40页。

哈亦恼羞成怒，却无计可施，遂以疯狂的屠杀恫吓汉族民众，又发动对明战争谋求出路，大败而归。其结果，后金在大厦将倾的危局中，结束了努尔哈赤时代。

皇太极统治时期，后金（清）仍时常遭受自然灾害的侵扰。

皇太极即位伊始，一面改善对汉族政策，以缓和矛盾，发展生产，一面继续以战争手段寻求缓解饥荒。天聪元年（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兵发朝鲜，迫使对方订立城下之盟，而跟随大军的，是上万人就食朝鲜<sup>[21]178</sup>；随后进攻宁、锦，大挫。据刘兴祚秘示朝鲜：后金“近日之势，已为穷寇，攻宁远不下，则欲敛兵无食，再攻不能，又不知将何往乎？”《满文老档》于天聪元年六月亦载：“时国内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sup>[13]第8册，3349[9]下册，857</sup>雪上加霜的是，受灾的东蒙各部，原仰赖明朝岁赏为济，而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年），明廷尽革之，加速了草原穷黎投金，却使皇太极困窘空前。翌年二月，仍是“年逢凶荒，边内边外，窃掠公行”。后金出逃者不绝于途。皇太极无奈，只好求助于朝鲜：“我国不必借粮于尔国，只缘近日蒙古人民尽为归顺，因借粮饷，欲为赈救之计”<sup>[22]第一辑上册，37[12]316</sup>。但朝鲜迫于压力不情愿提供的些许“援助”，至多可稍解燃眉。皇太极遂断然以破釜沉舟的姿态，冒险西征，越明朝北部长城，入掠京畿。此举虽有阿敏之败而使八旗兵未能在关内立足，却开辟了另一条攻明路线，拓宽了掠明途径，也予明朝以沉重打击。这种一箭双雕的行动，后来成为皇太极的习惯，金人中也盛行了“去抢西边”的说法。

但武力抢掠是要付出许多代价的，且非久远之计。而后金的窘迫一时难以摆脱，皇太极绞尽脑汁，采取“八家”分承经济负担、要求朝鲜开市贸易等办法，以期度过艰难。然而自然灾害频频降临，考验着满洲贵族。天聪六年（崇祯五年，1632年）“六月十二日，发大水，各路近水田禾淹没者半，其嘉禾间有为虫食者”，“沈阳南关外民舍淹没颇多，野兽蛇鳞亦漂去”<sup>[9]下册，1325</sup>。相公孙应时奏称：“惟是年来，国用不舒，仓廩空虚，民众地薄，生养不足。况又遭今年这场灾异，桑田尽成沧海，间阎十室九空，百姓不足矣，君孰与足哉。”臧国祚亦有“我国地窄人稠，衣食甚艰”之语。皇太极也承认：“北边地苦寒，民无生业，吃瞿麦，衣狗皮。”朝鲜情报：“虏中饥馑颇甚。”<sup>[23]19[24]第一本，22[13]第9册，3492,3506</sup>这场洪水泛发时，皇太极正在亲征察哈尔途中。此次战役，又有大批蒙古族或降或附，来到后金。天聪七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率官兵及其家属1万4千余人降于后金；次年二月，尚可喜亦率部降。人口骤增，生计愈形维艰，后金只得再向朝鲜求助：“我国受天之佑，阿奴车讷罗两国归顺者甚多。又毛兵投降者至于数万。无以接济，愿得粮

饷。”<sup>[13]第9册，3516</sup>“阿奴”即阿鲁，“车讷罗”即科尔沁。皇太极又令后金官员依其级别出资周济来降者，致使“旧官”牢骚满腹：“我国地窄人众，去年水潦，金汉官员糊口最难。”<sup>[23]59</sup>除此之外，皇太极的杀手锏便是继续掠夺。天聪八年金军出掠宣府、大同、山西地区；九年，多尔袞奉命远征，收察哈尔残部。崇德元年（崇祯九年，1636年），清军再次破长城入掠内地，掳获人畜179820，及其他大量物资<sup>[25]392</sup>。

崇德年间，清朝境内的自然灾害似乎甚于天聪时。

崇德元年十月皇太极谕：“尔等有粮之人藏粮，必待粮价腾贵方肯出粟，此何意耶？近当各计尔等家口足用外，其余粮即往市粟卖。恐有粮之家拒不粟卖，先令尔八家各出粮百石于市口发卖。”显然系粮食歉收，民生不足。翌年二月又谕：“去年春寒，耕种失时，以致乏粮。今春又寒，然勿以寒而误农时，俱著早耕，预先耘治。……若不勤督耕耘，致废农事，则依法处之。”<sup>[9]下册，1643[26]上册，254</sup>连续两年春寒之后，崇德三年，“辽阳旱蝗，秋禾噉尽”。是年九月，清军复掠内地，兵锋南达济南府，克70余城，掳人口462303<sup>[27]上册，330[25]601-602</sup>，其他财富珠宝尚不与焉。而后，崇德四年，“辽阳复旱蝗，秋稻靡遗”；五年，“辽阳大饥，父子相食，斗米一千二百，值银一两七钱”；六年，“麦大熟，百姓稍苏，而洪承畴提兵东征矣”<sup>[27]上册，330</sup>。质于沈阳的朝鲜世子等，证实清地逢灾属实。崇德六年十二月，“衙门使郑译来言，皇帝以为朝鲜王子入来今迨五年，不可年年给料，自明年耕作到秋谷成，当撒料，以八固山农田折给千日耕……此事以连年凶歉，八固山供料为难，诸王定议于帝前，以为蒙古王及诸部来属者，则或一年二年给料，而其后则皆给田自食”；“此处亦患年荒，且尚神祀”。为朝鲜馆服务的清朝通事也说：“年事凶荒，国用算计，则仅支明年五月。使群下扶助，吾亦纳米二十一石”。到七年五月的情况是：“此地饥荒太甚，谷价腾高，一斗之价，大米则二两，田米则一两半，贸得极可未易”，春夏干旱严重，五月下旬始有雨泽<sup>[28]第4册，2798[29]311,334,386,389</sup>。崇德六年四月至七年三月，正是明清松锦决战时期，清朝精壮投入战场，农事偏废，虽遇丰年，终因人祸而成饥荒。松锦大战结束，清朝除了增添人马、武器，而于生活资料并无收获，经济拮据再次凸显。皇太极只能重演故伎，于崇德七年十月命将出师，入掠明朝内地。此次计掳掠人口369000，牲畜321000<sup>[25]889</sup>。

皇太极于国家经济崩溃、军事受挫、人心近乎瓦解的危局中，接手了乃父的大业。虽然他始终未能使国家经济、民众生活彻底改观，但却躲过了一次次天灾的威胁，不断取得对明朝和蒙古的军事胜利，为清朝入关取代明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较内地落后许多，北方地区（含东北）尤其如此。大致来看，东北地区南部，主要是辽河平原，因气候适宜，农业

经济比较发展,其中辽东半岛的金、复、海、盖四州卫,堪称东北的粮仓。辽东都司的主体居民是汉族,其外则北部为蒙古,东部是女真。蒙古族以游牧为主,接近汉区者兼事农业。女真族虽然人口不繁,分布地域却较广,受自然环境影响,社会经济形态差别较大。野人女真或濒江海或处山林,过着渔猎、采集的生活;海西女真地接蒙古与汉区,故受不同的影响,叶赫部偏重游牧经济,哈达部农耕经济突出。建州女真居于长白山区,靠近辽东汉区和朝鲜,农耕经济有一定的地位,但山区的自然环境与地理条件,对农业的限制不可忽视,且农耕并非建州女真的传统,所以对其农耕收获不应估计过高,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渔猎、采集对他们经济生活的补充作用。

关于农、牧、渔猎之间的差别,陈述论道:“根据收入的稳定性即依靠自然的程度来看,手工业胜于农业,农业胜于牧业,牧业又胜于渔猎。但手工业是附于农牧的,牧畜、渔猎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界条件,狂风暴雨都摧残牲畜;农业也有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但比较牧畜渔猎要稳定。”<sup>[30]41</sup> 此系确论。但这里所指的农业,应是中原内地发达的农业,而非技术不精、产量不高如建州女真那样的农业<sup>①</sup>。所以,东北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基础是脆弱的,其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自然较差,更何况在他们之中,尚不存在仓储与赈济制度。

既然农业经济优于牧业、渔猎,发达的农业肯定胜于不发达的农业,他们的抗灾能力是有差别的,那么,第一,为什么明中期自然灾害的频度高于后期,而后期的灾害却与明朝灭亡相联系?第二,面临着同样的自然灾害,为什么农业经济发达的明朝却灭亡了,而经济落后的女真族却能够崛起?

明朝地域辽阔,又逢天文变化时期,东方不灾西方灾,此处旱赤彼处涝,有灾不足言怪。天灾实自然现象,时密时疏,灾频亦不足称异。问题是,同样地区发生同样规模的自然灾害,基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轻重有殊。此中因素很多,然天力仅居其次,最关键者在于人类自身。如生态环境的破坏,使灾害加重,乃至成为严重的饥荒,明末西北地区即是如此;再如社会生产力的摧残与政治黑暗,致使抗御灾害能力下降,遂呈饿殍遍野惨状,崇祯年间河南之情景给人印象尤其深刻。明末逢灾必饥,应主要是后者使然。明末灾害之所以醒目,实人类社会助虐。

明末北方地区自然灾害严重,其破坏尤烈,不仅仅是造成经济困境与民生凋敝,亦不只是引起一般性或局部的社会动荡,而是加强了对王朝命运的挑战。但这种挑战,并非由灾害引起,自然灾害只是起催化与推动作用。对此,计六奇给了我们提示,他“论明末致乱之由”,于当时可谓鞭辟入里。其文曰: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其故有四,而君之失德不与焉。一曰外有强敌。自辽左失陷以来,边事日急矣。边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则餉多,而加派之事起,民由是乎贫矣。且频年动众,而兵之逃溃者俱啸聚于山林,此乱之所由始也。二曰内有寇。使东师日迫而无西顾之忧,犹可以全力稍支劲敌,而无如张、李之徒又起于秦、豫矣。斯时欲以内地戍兵御贼,则畏懦不能战;欲使边兵讨贼,则关镇要冲又未可遽撤。所以左支右吾,而剧贼益横而不可制。三曰天灾流行。假流寇扰攘之际,百姓无饥馑之虞,犹或贪生畏死,固守城池,贼势稍孤耳。奈秦、豫屡岁大饥,齐、楚比年蝗旱,则穷民无生计,止有从贼劫掠,冀缓须臾死已矣。故贼之所至,争先启门,揖之以入,虽守令亦不能禁,而贼徒益盛,贼势益张,大乱由是成矣。四曰将相无人。当此天下交困之日,必相如李泌、李纲,将如汾阳、武穆,或可救乱于万一。而当时又何如也?始以温体仁之忌功而为首辅,继以杨嗣昌之庸懦而为总制,终以张缙彦之无谋而为本兵,可谓相有人乎?至如所用诸将,不过如唐通、姜瓖、刘泽清、白广恩之辈,皆爱生恶死,望风逃降者。将相如此,何以御外侮、除内贼耶?

计六奇将以上四方面关系,喻作人身有疾,“东师者腰背之患也,张、李者腹心之患也,水旱蠱虫者伤寒失热之患也,一身而有三患,势已难支,更令庸医调治之,其亡可立而待耳”<sup>[27]下册,682</sup>。他对“君之失德”这一重要因素不肯多揭,以“不与焉”三字巧妙带过。外患、内忧、天灾、乏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计氏的分析是比较清楚的。在此,天灾只是其中之一,且属“伤寒失热之患”,其要者在于人事、人为。不过,当社会紊乱近于崩溃时,自然灾害肆虐无疑雪上加霜;而当社会失衡时,自然灾害又会将大厦推向坍塌。天、人关系之微妙,尽在其微、其妙。

计六奇论天灾、人事,只是限定在明朝所辖州县之地,或者说,他是以民族来分内、外,而于边疆,却没有涉及。他解答了明朝为什么灭亡的问题,而没有探讨同样遭逢天灾的女真族为什么能够崛起。

明末女真地区与明朝一样,都是在社会动荡中经受着自然灾害的考验。不同的是,崩离析的女真族各部,面对灾荒的相互厮杀过程,也是大浪淘沙的过程。努尔哈赤能够成功,是因他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四处杀掠,与“草头王”式的其他女真族豪杰不同,他很富于政治意识。对本民族,他采取远交近攻、先袭弱后击强的策略;对明朝,他忍气吞声,利用明朝边政失误和辽东当局的腐败,尽力表示忠诚,以待时机。当明朝廷意识到建州的强大时,努尔哈赤羽翼已经丰满,在天灾无情降临和明朝步步紧逼面前,毅然对明宣战,依靠掠夺辽东财富,成功地度过了一次大饥荒。因

<sup>①</sup> 建州女真农业之落后,学术界有论述,本文从略。参见荣凡:《一种文化边缘地带的特有经济类型剖析》第六卷《明代后期女真社会的农耕经济》中的有关内容。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此,自然灾害不是建州女真起兵反明的根本原因,但具有推动作用。在努尔哈赤那里,首先考虑的是明政府“摧强扶弱”政策对他的威胁;他的势力日益强大后,野心愈益膨胀;他对辽东地区形势的认识,并对能否胜利作出判断。当然,还有积压心底的民族复仇心理。总之,自然灾害逼迫着努尔哈赤,而努尔哈赤不得已利用了自然灾害。就是这样一种逻辑关系。

皇太极在政治策略上,较其父成熟得多。与努尔哈赤一样,没有因为饥荒而排斥蒙古族,相反,利用天灾积极拉拢度灾艰难而又乱作一团的蒙古贵族,在与明朝的争夺中,将多数蒙古部落化为羽翼。皇太极更加聪明的是,他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与汉族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了辽东汉族的支持。人心向背对他越来越有利。后金(清)在有一定凝聚力中克服天灾,明朝则在人心思变中迎来了灾荒。还有一点,努尔哈赤、皇太极都在继续着女真族的掠夺习惯,只是他们制止了个人掠夺行为,而实行集体掠夺。掠夺的结果,不仅度过了天灾,争取了合作者,而且削弱了明朝,最终取代明朝。

所以,自然灾害在历史上的作用,视乎王朝政治而定,视乎人类社会基本状况而定。

#### 参考文献:

- [1] www. people. com. cn 大地,2004年(21).
- [2] 张丕远,龚尚法. 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气候变化的若干特征[J]. 地理学报,34(3).
- [3]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J]. 考古学报,1972.
- [4] 蓝勇. 中国历史地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 [5] 赵玉田. 明代北方的灾荒与农业开发[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 [6]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 留云居士. 明季稗史初编卷六. 烈皇小识[M]. 上海:上海书店,1988.
- [8]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G].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1984.

- [9] 汉译满文老档[G].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0] 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M]. 满洲篇. (日)京都大学文学部. 昭和二十一年.
- [11] (朝)申忠一. 建州纪程图记[M]. 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第十种,1979.
- [12]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三辑[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13] 吴晗.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4] 王钟翰.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M]. 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第七种,1979.
- [15] 海西女真史料[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 [16] 夏燮. 明通鉴[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17] 孙文良等. 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M]. 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第六种,1983.
- [18] 明实录东北史料辑[M]. 沈阳:辽沈书社,1990.
- [19] 谈迁. 国榷[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20]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 [21] 张葳等. 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M]. 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
- [22] 明清内阁大库史料[M]. 沈阳:东北图书馆,1949.
- [23] 天聪朝臣工奏议[M]. 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第四种,1980.
- [24] 明清史料:丙编[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2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6]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 [27] 计六奇. 明季北略[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28] 朝鲜世子从臣. 沈馆录[M]. 辽海丛书第4册. 沈阳:辽沈书社,1985.
- [29] 朝鲜世子从臣. 沈阳状启[M]. 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第十一种,1983.
- [30] 陈述. 契丹社会经济史稿[M]. 北京:三联书店,1963.

责任编辑 张颖超

## The Natural Disasters in Northeastern China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Nuzhen People

WANG Jing-ze

(Academy of Eastern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Beihua University, Jilin 132013, China)

**Abstract:** Academia hav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but didn'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rise of Nuzhen people. In fact, the natural disasters frequently happened in Northeastern China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ich brought about conflict among Nuzhen people, and the Jianzhou Nuzhen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rise up. The natural disaster was one of the factors for the attack of Nurhachu against the Ming dynasty. The interaction of the policy failure and the natural disaster also made the Later Jin who came into Liaodong fall into trouble. In the Huangtaiji period there were lots of disasters. He plundered the Ming dynasty on large scale besides adjusted policies, played the role of the Eight Banners, forced the Korea to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which not only weakened the other side, but also helped themselves to get out of the trouble gradually. But eithe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or the rise of the Nuzhen people, the effect of the natural disasters depends much on dynasty politics and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the late Ming dynasty; Northeastern China; natural disaster; the rise of Nuzhen people